



大会

第五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一〇九次全体会议
1996年4月17日,星期三,下午3时
纽约

代理主席: 迪亚洛先生 (毛里塔尼亚)

主席缺席, 副主席迪亚洛先生(毛里塔尼亚)主持会议。

上午10时15分开会。

议程项目12(续)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秘书长的报告(A/50/847)

秘书长转递公共行政和财政专家组第12次会议报告的说明(A/50/52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给大会主席的信(A/50/926)

决议草案(A/50/L.69)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 今天上午大会继续进行专题讨论公共行政与发展问题的全体会议。

我先请新加坡常驻代表发言。

考西坎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 专业经济学家自负地以为, 经济发展主要靠经济科学。显然这最多也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事实上, 专业经济学家并没有在管理实际经济方面取得明显的成功。自从1969年首次颁发诺

贝尔经济奖以来, 没有一个次诺贝尔经济奖是发给为东亚某一高速增长经济工作的经济学家。我谨指出这一点供参考, 同时也是要祝贺摩洛哥政府和发展支助及管理服务部组织这次大会复会, 讨论经济发展迫切问题中未能得到充分重视的一个方面内容。

1993年世界银行题为《东亚奇迹》的报告指出, 这场奇迹其实并非奇迹。其中奥密在于将宏观经济基本问题搞对。这一点大家知道已有几十年。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更加明显地突出了决策者和理论家多年来设法解决的发展问题。就适当的发展战略进行的纯粹的经济辩论, 在实际意义上讲现在已经结束。不参加显然不是一种选择, 它只能加快边缘化速度。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现在已经为人们更好地了解的话, 那么事实仍然是, 世界许多地区没有或者很少增长。差别就在于公共政策。其它模仿东亚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失败了, 原因不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政策, 而是因为它们缺乏社会政治基础, 无法使这些政策持续。正是在提供这些基础方面, 公共部门和政府的作用, 按我的定义是政策体制和行政体制——对发展进展最为重要。而且, 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基础是政治稳定和善政。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跟上进一步发展的全球经济或被抛在一边的是公共部门中政府治理。

当然,形形色色的权威大师们现在已把“善政”作为流行的说法加以兜售,虽然他们晚了一点。在此,我谨请同事们注意另一种现象。西方知识分子,甚至行政管理人员和商务人员,往往多少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设想发展中国家的机构。这或许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已经就善政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几乎带有神学的气味。我把这些辩论说成是神学辩论,因为它们辩论的往往是善政的理论,而不是实践。

不用说,在现实世界中,对任何政府的真正考验不是它是否遵守那一特定政治理论或者理想,而是是否能够有效、公正治理,是否能够改善大家的福利。归根结底,政府的失败不是因为它们缺乏崇高理想,而是因为它们无法兑现。决定某一特定形式的政府是好是坏的是实践的严峻考验,而不是抽象或先知先觉的理论。归根结底,一个好的政府是一个有效的政府,而有效的东西必须务实。在一个国家行之有效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不一定成功——这是一条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常常被忽视。正是亚当·史密斯为最早的经济科学大师曾经挖苦地指出:

“有学问者否认他们感觉的事实,以保护他们空想的思想的连贯性”

——不幸的是,这种态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麻烦。

因此,我要强调,新加坡并不认为自己是任何人效法的样板,尽管我们很高兴地与可能有兴趣的任何人交流经验。我们通过《新加坡合作方案》将这种作法制度化。任何人都不能为任何国家规定任何特定的政治发展或公共行政模式。如果在对具体情况的复杂性只有肤浅了解的情况下试图去这样做,那便会导致灾难。我们的基本看法从根本上来讲是务实和多元的,这就是,没有任何可以到处适用的模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研究尽可能广泛的经验。我们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冒昧地就新加坡的经验提出一些意见。我们认为很多人也许会对它有些兴趣。

新加坡在过去三十年里有着稳定的政治环境。投资者预计这一稳定将继续。他们敢作长期的计划,而不必担心政府的政策出现倒转,或者出现更糟的政治动荡和混乱情况。的确,新加坡的外来投资者常常说,政治稳定是影

响他们决定在新加坡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连并非只存在于新加坡。有许多研究报告显示,如果政府频繁变动,或发生政治动荡,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低得多。

在新加坡,政治稳定是与三个相互关连的要素为基础的,它们共同决定了我国的善政。这三个要素为:政治上担负责任、长远定向和社会正义。

为了长期的稳定,政府必须在被治理者的支持和同意下治理。在新加坡,宪法规定每隔五年举行议会选举。21岁以上的所有公民都享有普选权。因此,在新加坡政治上的责任是通过与多数西方国家的选举类似的自由、公正和廉洁的选举而担负的。但是,对定期举行自由公平选举的这种需要并没有规定任何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具体模式。对立的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喧闹、街头示威和不受制约的新闻界也许会是更刺激的电视画面。但是它们也许对某些政府和国家确有作用,但经常的情况是它们与善政的第二个支柱,即长远定向相矛盾。

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是一种行政文化,它不是基于对政府的根本不信任,不是充其量把政府视为一种绝对的恶魔,必须随时对它进行制约,或迫使它在每次出现意外的曲折变化时对选民的好恶作出反应。这种政府模式很易受经济上的平民路线的影响,使它很难长远定向。在新加坡,政府更象是一个受托人。公共部门作为人民福利的监管人对那些与人民的长期经济利益有好处的事情作出独立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

政府的政策不是由民意测验或公民投票决定的。这有时意味着不顾平民主义思想的压力选择采取“更便捷的”经济政策。的确,实施正确的政策有时意味着下很苦的药来克服经济挑战。我们的经验使我们相信,政府的首要责任是治理,而且是公平有道德的治理。象受托者那样行事也赋予政治领导人和公共部门正直治理的最大责任。有时这需要采取严厉的行动来对付派别压力,对腐化现象采取迅速、透明、公平和无情的措施。

新加坡实行的这种托管式的民主模式使我们能够执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严厉政策。政府作为受托者的概念是与担负责任并行的。由于政府充当了人民诚实和正直

的受托者，自1959年新加坡实现自治以来每次大选都使它连续掌权。有了绝大多数支持和强烈的使命，我们得以在处理经济问题时从长远出发。

长远定向也已成为东亚其他国家政府的特征。它们也愿意作出短期的牺牲，以获得长远的利益。归根到底，善政并不只是指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而且也是指实施有利于公众长远利益的政策，尽管此类政策在短期不受欢迎。

善政的第三个要素是能够实现社会正义。在新加坡是通过平等对待所有群体，给落后者提供迎头赶上的机会来作到这一点的。我们一直公平对待所有民族、宗教、经济和社会群体。因此政府不对任何特殊利益集团承担义务。这一点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很重要的，但在新加坡这样的多种族社会里尤其如此。在我国保持和睦有时也需要强硬手段。

新加坡社会正义的另一个方面是政府努力给每个公民提供竞争和取胜的平等机会。我们强调经济效率和精英管理。我们还始终意识到，需要防止逐步出现社会的阶级分化。但是我们为消除社会差别所作的努力始终是受机会平等，而不是收入平等的原则为指导的。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参加竞赛。但并非每个人同时到达终点。这一现实就是政府对它的社会设施，即教育、住房和基本保健提供巨额补助的原因。但它没有把过多的资金用于社会福利补助、失业补助和消费补贴。把过多的资金花在社会福利方面有损工作意识，打击进取心并使家庭受到削弱。另一方面，把钱花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为所有人提供了平等机会，因而有助于社会流动性。

对待公共部门和政府作用的这种总体办法指导我们应付了独立后三十年的经济挑战。经济发展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它需要不断作出努力并进行调整。历史是没有终点的。现实世界的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找到永久和完美平衡中的那个永衡不变的固定点。如果社会幻想达到了这样一个无忧无虑的境界，它很快就会滑落。政府、公共部门甚至私营部门和个人都必须不断进行调整，以应付新的挑战。但是，任何组织如果只是为了应付情况才作出改变，那么它就会成为周围情况的奴隶。在新加坡，我们把变化作为一种必要的生活方式来接受，它当作改善和

提高的一个手段。也许由于我们国家非常小，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因此更容易接受这一点。

变化是连续不断的，但新加坡公共部门经济管理的指导思想的基础始终是保持相对稳定的两大原则。首先，经济在自由市场体系的基础上运作。允许市场力量占主导地位，以便我们的企业和商业能够对市场的信号作出反应，并据此调整它们的策略，有效地分配和使用很少的经济资源。政府尽可能对公司的经济决策采取不干预的态度，除非它们涉及严重的社会或政治问题。

第二，经济中存在高度的外向型。新加坡对国际贸易和投资高度开放。我国的贸易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近300%，是世界上最高的。我们不仅允许国内公司之间的公开竞争，而且也允许来自外国公司和产品的竞争。这确保本地公司保持全球竞争力。

我们认为，区域和世界增长取决于机会自由和各经济体间的经济联系。因此我们放眼国外。我们在各国际和区域论坛，例如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亚太经合会)和世界贸易组织(贸易组织)与意见类似的国家一道努力推动自由贸易事业。在区域范围，我们认识到新加坡的繁荣取决于我们邻国的繁荣，我们的繁荣有利于它们。发展并非一种得失所抵的竞赛。

新加坡公共部门的经济管理是在宏观层次进行的，其目的主要是找出问题或机会，确定增长的大方向和战略。这一宏观经济管理作用是通过政府执行三项职能来发挥的。

第一，政府为商业提供稳定的环境。谨慎的财政管理确保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指导新加坡财政政策的原则是，它应该支持作为增长动力的私营部门。新加坡政府在其预算政策中一向十分保守，并在过去25年来几乎每年保持预算平衡。货币政策旨在将通货膨胀保持在低水平，以便有长期的竞争力，并确保储蓄不贬值。政府还为竞争规定了明确的、透明的规则。

第二，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和人力，在这两个领域，如果缺乏政府行动，私营部门就可能投资不足。政府确保教育和培训适应经济需要，特别强调培养技术和专业

人力。我国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的一半从事科学和技术工作。

第三,政府为商业、包括愿到新加坡来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便利。这一职能主要由作为法定董事局的推销机构来履行。

我并不知道新加坡或其他国家的未来如何。发展中国家运作的全球环境将继续在很大程度上由大国——其贸易政策、其冷战后政治优先及其对国际合作的立场决定。然而,我能够有把握预言的一件事情是,国营部门和政府将继续是决定发展中世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使人们有理由抱有信心而不是感到绝望。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为了掌握它,我们必须客观地、务实地——而不是透过这种或那种理论的失真镜片看待世界。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委内瑞拉常驻代表发言。

特赫拉-帕里斯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委内瑞拉宪法》法规和其他法律在我们的报摊上出售,不只一位观光者觉得这个事实很惊奇。自1864年以来,委内瑞拉的每一条法律都有一个只涉及该文本的标题,当一条法律被修改后,它必须全部重新印发。

刚刚废除死刑的1864年立法机构希望尽可能大力宣传法律,以使每一个公民容易地获得这些法律文本。在委内瑞拉,没有任何编号的法令,也没有任何进行部分改革的要求;相反,有一项长期有效的邀请,即请公民自己告诉自己其权利和义务。许多公民本着善意这样做,但总是有一些人利用这一点来回避其义务——钻空子。

两年前,一些银行家在风行的所谓“解除管制”的影响下以这种方式设法绕过银行法,从而造成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严重的腐败行为对一个国家良好的行政惯例造成影响,在这个国家中,十多年来看上去基础牢固的道德败坏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以及中下级官员的腐败和贿赂民众化已达到我们以前只是在其他国家看到的程度。

幸运的,在委内瑞拉,人民强烈地、大声地谴责腐败。人民热情地支持对那些腐败者进行起诉,并支持新法律和更加严格的条约以便利引渡或惩罚罪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卡尔德拉总统主动地、坚持不懈地努力促成打击腐败国际条约的签署。

召开大会这些会议的目的是为确保交流有关公共行政的信息和经验。我们认为,在这一方面采取的最重要步骤是1996年3月29日在加拉加斯通过《美洲间反对腐败公约》,立刻由该半球21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

为了能够施政,一个政府必须得到其人民的尊重。没有人尊重一个腐败的政府或一个对犯罪手软的司法制度;没有人会尊重一个罗唆的或软弱的议会。分机构必须符合其目的,它们必须随时准备根据社会的需要发展和改革自己。

我今天要请大会优先重视反对腐败的斗争,并确保给迅速转移金钱和个人迅速航行提供便利的全球化以同样迅速地引渡罪犯及其脏物来加以补充。这是人民的要求,这将意味着伸张正义。在这些国家——大国,国内腐败行动成功地受到起诉,但是,贿赂其他国家官员这一可耻的做法却得到宽恕。这些国家的大公司,其中一些是国营企业包括武器制造商从其预算中拨款招待和贿赂外国官员。甚至向这些叛徒支付的款项可享受免税。

另一方面,美国多年来依法严厉惩罚那些为了出售其产品敢于贿赂外国官员的人。所有国家应该学习这一榜样。达成一项诸如3月在加拉加斯签署的《半球公约》之类的普遍条约将是对在权威薄弱或不存在的地方加强权威的一大贡献。

不道德行为和无法无天现象并不是任何国家独有的问题。卡尔德拉总统在欧洲联盟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反对腐败多学科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腐败是对具有欧洲民主制度社会的主要威胁之一”。

我要在这一国际大会上说,一般的腐败,尤其是行政腐败是世界规模的威胁,因此,要求所有国家齐心协力地采取行动,集体地对付这些威胁。

打击腐败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改进公共行政和法律、立法和行政权力的职能,也具有同样的政治性。摩西发明了显然是濒于灭绝的行政金字塔,从他开始一直延续到白哲特、韦伯、久利克、泰勒、厄威克、加尔布雷斯、法约尔和其他行政科学的先驱者,每个国家都增添一个又一个行政改革委员会,并设立其名称反映出我们这门科学的各种昙花一现的种类的部门和机构。

在座的各位专家都会记得为解决行政问题所提出的各种模式和良方。1930年代,凯默勒先生经过本大陆,宣讲审计局主义,而最后在那些已经有以其他名称而存在的这种机构的国家建立这种机构。在格赖古纳斯掌权之后,我们看到避免交叉、重叠、协调—因为人们并不“命令”或“指导”,而是“协调”—规划—而非“计划”—以及其他直到最近出现的方法:透明度、责任制、私有化、缩编—其影响为大规模解雇—以及权力分散。如同在药理学中一样,每个药方的成功取决于是谁及为谁用药,每种药只要剂量适度都有其优点。

今天,我们知道行政金字塔需要截短,而改组必须通过进程而非任务来进行,然而一些人仍然严肃地致力于设计流程图,拆了东墙,补西墙。这种流程图的各种类型象文艺复兴和抽象艺术之间的风格一样多,然而以其规模判断,一些部门所制订的流程图显然似乎受到博特罗的启发。

卡马克女士代表美国报告了有关该国努力削减和精简官僚体制的情况,这一体制中有200万公共雇员。她应为下列事实感到安慰:仅仅委内瑞拉教育部就管理着估计由17个工会所代表的500 000名教师。该部有自己的成功,不应获得联合国一项冠以“在社会领域中实现新的国家行动模式”的题目的报告中所作的肤浅的评论,即在委内瑞拉:

“一个关键部门的社会政策中领导才干的试验…显示了通过单一部门而协调活动的问题”。

可怜的教育部:但它在这方面并不是单独一个。至少有另外四个部、23个管理分支机构和数以百计的城市—都以分散权力—试图改善2 200万居民的命运,其中60%在22岁以下。

还必须承认委内瑞拉公共行政在教育、卫生、建立庞大的基础设施以及保护环境和大规模国家公园方面的成功。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权力比较分散的行政体制取得的。今天,委内瑞拉的立宪发展倾向于加强各州和各城市的能力—即倾向于分权化。然而,对分权化过于热情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必须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例如已经存在的十分严重的维修问题。特别是在象高速公路这样的实际基础设施方面,世界银行告诉我们:不在及时维修方面投资的每一分钱,都会使道路和车辆修补费用扩大两倍。无疑,这会对医院、学校和其他机构造成更大损害。

我不想以一种令人扫兴的语调结束我的发言,但我必须承认:有近七年的时间我一直是联合国公共行政专家。那时候我散发流程图、成立行政学校并提出有关规划体系的建议。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追踪技术援助的发展和公共行政司进行的有关我们这门科学的研究。我可以向大会保证,所积累的知识与信息是宝贵的。二十多年来,举行了多次专家会议,导致一门新的行政科学分支的诞生,这就是政策制订学。现在,在秘书处内部有几种思想派别或思想库,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把思想家同鱼相比,他们具备显然有能力向各国政府提供建议的头脑。我认为,我的同事芬兰常驻代表比格曼先生在呼吁使秘书处工作更专业化的时候也指的是这一点。

在所有行政体制中,都存在一种无法改变的二项式:行政即计划和执行。光执行而不计划就如同没有理想和理智地行动。光计划而不执行则是一种梦境。好的领导者不能忽视他通过制订政策的手段而明确的目标。他或她应表明,在政府行动中重要的是“为何”而不是“为什么”。不幸的是,那些失败的行政人员都倾向于喜欢后者。

对明确目标的认知是公职雇员工作中的最佳动机。管理者的诚实和严格的榜样,会引来尊重和执行命令的意愿。对雇员的健全的选择和社会保护制度,也是很有益的。然而,在分析公共职能在发展中的作用时,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为诚实的官员提供稳定,而对于那些由于感到不可抗拒或在消费文化和无耻的贩子的鼓励下利用一整套无用的规章及所掌握的控制来肆无忌惮地进行贿赂者,则不能提供这种稳定。

我希望象这样的会议将刺激社会改革并加强必要的教育制度,为良好行政创造正确条件。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芬兰公共管理研究所公共管理改革处主任西尔帕·吉科宁夫人发言。

吉科宁夫人(芬兰)(以英语发言):芬兰也持有意大利公共服务、区域和体制事务部长莫佐先生代表欧洲联盟在发言中表达的观点,并完全赞同这些观点。

芬兰非常重视大会第五十届会议本次关于公共行政与发展问题的续会。一个效率高、卓有成效、运作良好和透明的公共行政是所有国家公共服务发展和管理的先决条件。我们欢迎在专家小组内容翔实的报告所阐明的三个广泛目标:即有效和参与或行政管理、全球市场经济的出现和更多地承认社会正义问题基础上,以全面和着眼发展的方式讨论公共行政的作用。我们还对本次续会吸取各国经验的主旨表示赞赏。我们认为,尽管各国的情况和行政文化不尽相同,但这些共同基本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

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政府和文明社会都必须作出有力承诺。一个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开放和民主社会是这项有力承诺的最佳促进者。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包括,大众参与政治进程、参与有关发展选择的决策并参与经济和人力资源管理。

我们承认各国在努力发展富有奉献精神 and 着眼发展的公共行政过程中都遇到困难,特别是现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公共部门都因全球化和同时出现的资源限制而面临巨大挑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结构调整方案要求进行深刻改革。同时,在工业化国家中,公共部门也受到严格审查。存在着建立新的决策和公共管理模式的明显需要。全球化要求采取其他替代的办事方法,因此,各国政府必须考虑做些什么和如何去做。但是,一个民主社会不能由上而下地建立。还应该允许文明社会为加强民主和稳固的行政文化作出贡献。

近年来,芬兰经历了一个公共部门改革的时期,目的是改善其公共部门的成本效率,并按其民主传统加强其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向一个着眼于业绩的公共部门过渡,应

特别强调决策者负责和在公共部门管理与运作中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已对预算和财政管理制度以及人事管理进行深刻改革。许多政府职能都重新安排,成为公共企业或公司。管理方法的改革和放松管制,也是目前改革议程上的重要议题。

新的公共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下放权力。另一方面,目前的趋势突出了在决策一级加强战略思维、长期观点和妥善协调行动的能力的需要。

我们认为,必须把公共部门的改革有力地集中在公民的需要和权利上。从公民的角度看,今后还必须捍卫芬兰公共部门传统上一直支持的平等和正义等基本价值观念。公共行政是为公民而设立的,对他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公共部门必须具有为经济负责的能力,而不是相反。

对政府信任的削弱可能会使关系更加紧张,从而要求人们必须审视有关公共部门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的问题。在一个动荡不安和日趋相互独立的世界中,私营和公共部门伙伴关系的新模式可能是建立一个更敏感地回应公民需要和更能为经济和文明社会服务的政府的一个途径。

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共部门如何获得和保持回应迅猛变化局势的能力。准确分析、远见和各种替代方法都是适当和有效的规划以及稳定和灵活性相结合所必不可少的。为了使公共部门改革获得成功,必须让工作人员参与这一进程,因为发展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包括为改变行政文化创造基础。还应明确表明,强调公共部门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培训和技能发展至关重要。

芬兰发展合作政策强调受援国致力于并拥有发展进程。我们在经济、环境、社会和行政上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努力,包括必要的体制改革。我们还支持旨在下放权力和加强地方行政管理的各项努力。决策者守法、废除腐败和在政治及法律上负责非常重要。必须促进社会各级都在执行发展活动方面采取参与性办法。促进私营部门参与的有利环境也是芬兰发展合作的一个重要目标。

整个联合国系统,包括其各活动基金、各方案和各专门机构都应应对公共行政在发展方面的作用和运作情况进

行审议。我们认为联合国在公共行政领域有两项重要任务：第一，为有关公共行政与发展的问题，特别是为此次续会的后续行动提供一个全球论坛。第二，成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过渡国家改善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的媒介，同时特别强调最不发达国家。我们认为这两项任务不需要创建新的行政或政府间体制。应该主要通过现行体制，特别是通过已几乎在所有受援国存在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支持这一部门的业务活动。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以色列总理办公厅部长约西·别伊林先生阁下发言。

别伊林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这是一个致力于改善公共行政和改革公务员制度的政治家和专业人士的论坛。本次会议给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使我能够就公务员制度同各位学者和政策制订者交换意见，并进一步了解其他国家政府在调整行政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和日趋现代化的社会的需要方面所作的努力。

我并不认为有任何必要详细说明世界各地的文职机构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前的时代，人们指望它们在经济上更加节约，然而效率更高，更能满足公民的需求。这两种趋势使政治领导人、规划人员和同公民直接接触的公务人员面临一个难题，面对一种冲突的局面，他们现在必须应付两个看来不相容的目标：更有效地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不能超过经常遭到大幅度裁减的预算的限制。我认为，我们以色列人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以公正和民主的方式解决这一冲突，是未来几年中文职机构改革的主要目标。

我们各项努力所遵循的策略的基础是公共部门管理的进步模式，但也意识到结构和程序改革必须考虑到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以及进行这些改革的文明社会的经济限制。

尽管以色列认为自己是一个年轻的小国，但它自豪地认为自己是联合国老资格的会员国之一。此外，我们人口在过去50年中的迅速增长使我们处于这样一个状况：我们的公共行政机构必须面对其他一些较大的联合国会员国显然也面临的许多问题。

尽管以色列是于1948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建国的，其社会机构和政府结构的历史根基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打下的。许多重要组织结构，包括司法制度如果不是从英国委任地继承过来，也是向它借来的。我们目前正在设法使这一遗留下来的行政结构和程序实现现代化。

我们全神贯注地保障我们的生存、保护我们的安全、吸收难民和移民并在最充分的意义上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这使我们无法把足够的精力投入文职机构改革的任务并协调进行调整，以适应我们动态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求。全世界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诸如和平进程的扩大以及我们经济的大幅度改进等中东的变化，现在使我们有机会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集中在这些方面。

我也非常高兴地指出，一些指引我们努力的方法，以及一些作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的基础的原则，得到了参加本次重要会议筹备会议的其他国家的代表和专家的赞同。

我认为，我完全可以说，在加强协调的同时进行私有化、权力分散和下放权力是以色列提高其公共服务机构的效力和效率的努力的基石，特别是那些直接向其公民提供服务的机构。在今年早些时候在柏林举行的关于公共行政在促进经济改革中的作用的区域会议上发表的报告中，我发现了一些同我刚才提到的我全心全意赞成的三项原则有关的内容。例如，报告指出，在其经济从高度集中的状况向能够被纳入全球市场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每一个国家里必须进行公共部门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重新确定国家的作用。此外，改革的方法应当把公共行政部门看作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以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和公民的要求的制度。

以色列的特征是官僚机构的高度集中，我国协调国家机构时面临严重困难。许多在座的代表必然很熟悉各部门和机构由于担心有人企图破坏它们的权力而不愿进行合作的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障碍，我们开始举行政府各部首长组成的一个论坛的定期会议。这一机制大大促进了合作，为旨在解决问题的步骤提供了支助。

另一个我认为在这方面需要谈到的问题就是政府的决策过程。请允许我引证一个我担任以色列政府部

长时的亲身经历。一些需要作出行政决定的极其专业性的问题常常被摆在政府的面前。显然,多数部长们在许多这些问题上没有多少专长或经验,这一局面常常使他们完全依赖从主管部长那里获得的信息或建议。那位部长被假定已经对现有的选择作了调查,其中最好的选择被摆在政府面前。我认为,更加适当的方法就是把全部选择都摆在各位部长面前,以便每一位部长能够在作出决定之前作通盘考虑。在我被任命为部长之后,在前总理、已故的伊扎克·拉宾的支持下,我在政府的每周会议之前开始准备有关议程上重大项目的背景文件。这些文件并不是立场文件,它们的目的是对有关的历史背景以及每项决定的意义和可能后果进行分析。我可以肯定,这些文件已经证明对部长们作出决定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另外,我们还正在深入讨论有关政府行动的规划和预算的议题。我们同意限制政府部门的总数。已经通过的对我们政府基本法的一项修正案把1996年5月即将举行的选举之后的部长人数限制在18人。部门的实际数字甚至可以更低。

我谨提一下这项拟议的改革的一个例子,这项措施已经采取。到1996年3月为止,我一直担任总理办公厅部长,而不是经济和规划部长。这项改变是我在任期之内提出解散经济和规划部的建议之后作出的。我当时注意到,这个部作为一个独特、独立机构存在是没有理由的。它的各个司可以很容易并且更加合理地并入一些其他部。这一行动是我们为使政府尽可能精简和提高效率所作努力的一部分。

尽管我赞成这样的理论,即每个政府机构应当确定自己的政策和业务目标,并且自主控制执行这项政策和产出的流动,但我并不认为这意味着各机构应当提供一整套相关的服务。我认为,诸如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之类的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最好应当相互竞争,以争取顾客。我们按照竞争原则开展业务就能够大大裁减公共开支并提高服务的效率。

但是,在提出这一服务兑现概念的时候,我们应时刻牢记,我们的客户也是公民,政府授权提供服务的那些机构,实质上正是用他们付税的钱经营的。不断认识到这些

服务项目是公共所有的突出特点,应是引导我们改革的指南。

在我看来,所有的民主国家,包括以色列和所有那些正在走向民主化和自由经济的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因素是我们现在在以色列争取贯彻的改革的动力—我相信,我们必须继续支持这些改革。

第一个特点是预算缩小,需求扩大,同时公众激烈反对加税。政府机构的运作能力和财务能力似乎跟不上需求发展的速度,或是公众对扩大服务和不断改善生活质量的期望。

第二个特点涉及公众对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 and 公共行政表现的不满。

第三个特点涉及主要出于近视的政治利益或为了满足人口中某一特定部分而执行的项目和方案的规划与执行问题。大多数公民并不总是认为,这些项目有必要,但是尽管代价高而实际的结果又难以肯定,这些项目却继续得到资金。

我们的第四个特点是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这是态度的改变、媒体的作用和作为当代特点的资讯流量不断增加等因素造成的一种后果。这种新的关系可以说是对个人公民权利的修正认识。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内的公众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懂得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因此,民主政府有责任响应它们的公众对尊重行使这些权利的越来越高的期望和因此而产生的要求。

在这方面,我想谈谈以色列公务员制度如何响应我国社会中两种不同团体的需要。我这里指的当然是来自前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的新移民潮,以及我国两大少数民族,即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德鲁兹教派穆斯林。公务员制度已经开始招聘新移民,这不仅是为了提供就业,这是每一个公民的一项基本需要,但最重要的是,作为提高本制度对这两种人口特别需要的敏感性的一项措施。就我国的阿拉伯和德鲁兹少数民族而言,我们已经成功地执行了一项有目标的补救行动方案。我高兴地报告,在过去两年中,少数民族就业增加了20%,这一速度超出了核心方案的期望。

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些官僚模式,那些历史上用来塑造我们的公共行政和治理体制的模式,现在正在被取代。新的方针强调权力分散、自治、专门化、服务质量、参与决策、定目标管理、区别报酬和责任心。这些事实上扩大了公务员制度传统概念的范围。

鉴于上述特点和现有公共行政管理新模式,现在以色列推行的改革是根据四项首要目标制定的。第一,大幅度裁减公务员制度和分配给它的资源以及受政府干预的部门。第二,重新界定政府各部的权力和责任,使它们成为侧重政策制订、监督和对业务方案进行系统评价的战略参谋机构。第三包括改进执行机构在管理发展、预算、工资政策和利用人力资源方面的执行与管理能力。第四个目标是把一些行政机构作为自主和实现利润-费用的中心。

实现这四项目标有赖于应用公共行政改革的三项中心原则—权力分散、权力下放和个人负责—以及按运作和产量预算。现在这一辩论的架构不允许我详细地谈论这一课题,但是我想代表们是熟悉这些和其他相关的概念和模式的。

我感到鼓舞的是,这么多的国家中都有同样的政府和行政改革的趋势。这说明其他国家政府认识到需要采取措施以提高其公务员服务能力的程度。我认为我还可以假设,我们大家都体会实现这一变革有多少问题,以及协调所有有关的公共和私人部门及其各种利益有多难。说到底,我们不是在简单地修改结构或进程,我们是在对所有利害攸关者所掌握的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概念进行革命性改革。

最后,我谨重申上月份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公共行政国际专题会议结束时提出的两项原则。我认为它们特别适用我们的讨论。这两项原则是,一、通过推动私人企业提供以前由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政府可以提高效力,以及二、新的公共行政模式应该强调公共行政和文明社会之间的伙伴合作。

然而,如果允许的话,我最后要提及作为我们公务员制度改革基础的一条基本信念。我们以色列人不把改革当作面对公众对某一项服务或其他服务情况不满而紧急

救火的一种策略。相反,我们认为改革是定期审查公共议程上的问题,规划和落实修正措施,以及评价其结果的战略。这样重新评价必不可少,只有这样公务员制度才能跟上社会发展,从而继续成为执行政策的一项有效工具。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尔巴尼亚代表发言。

库拉先生(阿尔巴尼亚)(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秘书长提交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该报告向会员国提供了有关公共行政的效力和联合国在这方面作用的新看法。

阿尔巴尼亚走上民主的道路至今已有四年,在所有领域发生了强有力的变化。为了摆脱一切属于国家,一切由国家实行中央控制的制度,阿尔巴尼亚不得不应付建立一个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挑战。

经1992年的民主选举产生的阿尔巴尼亚行政当局的主要目标如下:下放权力和确立国家的新方向;分权和建立自治,确立法治,使私有财产制度化和保护私有财产,以及设立地方政府并使之适当运作。

四年后,我们可以说,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经济稳定在阿尔巴尼亚已成为现实。各金融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提供的援助方案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我们实现了中型企业和土地的私有化,开放了物价,控制住了通货膨胀,使国家的货币得到稳定,并为外来投资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气氛。

在进行这一经济改革的同时,我们颁布了支持私有化、外来投资、新的银行系统和关税及税收制度的新立法。所有这一切导致建立了对阿尔巴尼亚经济改革的进展来说十分重要的体制构架。

在这一情况下,建立一种模仿发达国家行政制度的现代行政继续是我国政府的一项优先任务。行政领域的改革重点如下:第一,以最好的方式为纳税人服务,通过安排中央和地方各级的行政工作来支持发展—为此,我们现在正从政治上确定规定公共行政各部门任务的方案;第二,为完成这一任务建立最适当的结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

建立了各部的结构,我们现在正在为中央和地方行政的其他机关继续这项工作,以便准确确定各级行政的作用,实行分权,消除并行的结构,并弥补不足,第三,在建立这些结构后,聘用合格的人员,让他们进一步接受职业教育;第四,改善公务员的形象,这一形象是与他作为一个雇员的信誉密切相连的——为此,阿尔巴尼亚议会不久前通过了一项有关在公共行政机构任职的法律;第五,通过一个综合薪金表来控制行政机构雇员的数目和他们的薪金;第六,将政治、行政和管理职位的作用分开,以促进行政机构的工作效力。

目前在阿尔巴尼亚,联合国各机构,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联盟正在实施鼓励私营部门、建立基础结构、保护环境和改革银行系统的援助方案。我要借此机会感谢这些机构通过上述方案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技术和财政援助。

为了密切跟踪公共行政结构的改革,我们设立了与部长会议相联系的公共行政部,以及一个部门间工作小组。经过两年的努力,该部门除其他外,完成了下列工作:草拟了一份政府手册,在部长会议的主持下设立了一个公共行政信息中心,拟定了一套公务员守则草案和道德准则草案。它还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公共行政部门职员的培训、招聘和晋升制度。

我们尤其重视通过组织专业人员培训班来加强地方政府,以使改革以同样的速度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进行。

我们尤其重视秘书长报告中的各项建议,它们涉及设立特别咨询机构,订立发展基础结构的方案,考虑环境保护标准,建立专业税收行政,通过有关行政和加强法庭在解决行政纠纷方面作用的全面法律纲要,批准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就业和社会发展的公约。

阿尔巴尼亚需要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技术和财政援助,以执行这些建议和联合国所有国际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

我们认为,有关改组联合国公共行政方案、设立一个紧急基金、建立一个国际基金把环境问题纳入基础结构

发展方案,以及把专家小组置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领导之下的各项建议将加强联合国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作用。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塔赫特-拉万奇先生(伊朗)(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秘书长和专家小组拟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

大会讨论公共行政和发展问题的续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场所,各会员国可以如大会第49/136号决议所述,通过交流这方面的看法和经验来讨论这个重要问题。我想阐述我们认为对成功进行有关这个议题的辩论来说很必要的一些最重要原则。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确认,公共行政的作用、地位和运作是与每个国家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的。他进一步指出,这方面任何努力的主要责任在于各国政府。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表示的意见。

应该指出,这一信念内在地起源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文字。

此外,由于各国的政府结构和公共管理制度因其特有的价值观念和历史、文化和哲学背景而大不相同,所以全面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必须包括充分考虑这些发展管理的最基本组成部分。

根据这些原则,以及国与国不同的发展优先项目现实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要确定和提出一个将一律适用的更加有效和高效率的公共行政管理发展问题的模式是相当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尽管根据各国人民的需要发展和促进有效和高效率的公共管理是一个全世界所有国家关心的问题,但秘书长的报告中所载的一些建议似乎并没有接受上述原则,并且进一步地假设,能够找到一个其他国家可适用的完美和逐步形成的善政模式。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并在某些方面,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患有同样的弊病,这些弊病有时候可

能使行政机构瘫痪,并给进展造成一些障碍。然而,这些障碍比不过不利的国际发展环境和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和技术,这些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障碍,并且也是更加有效和高效率的公共行政的先决条件。

关于体制安排和后续行动问题,我们认为联合国系统范围内的现有机制和机构应该继续象以前一样运作,并且继续充当促进交流信息和经验以及应其请求向个别国家提供援助的论坛。

现在请允许我谈论一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中在公共行政和发展方面取得的经验、成就和面临的挑战。17年前,除其它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前政权那里继承了一个高度依赖石油出口收入的经济,普遍的贫困和文盲、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不足,以及一个低效率的政府机构。

在1980年代初,毁灭性的八年战争使这一局势更加恶化,由于战争,有必要调动大量可得到的资源。此外,我国面临许多自然和人为灾害,包括普遍的洪水、可怕的地震、海平面上升造成的破坏、数百万来自邻国受战争影响地区的人民移居我国、以及针对我国的强制性经济措施。

然而,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的根据民族价值观念建立一个以民主、自由、独立和社会公正为基础的新制度的努力是巨大的,制订和执行了一项直到1980年代末的第一个五年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计划。

尽管当时国内外灾难重重,但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在这项计划的执行时期实现了令人鼓舞的7.3%平均年增长率。

经济结构调整、自由化、偿还债务措施、预算平衡,更有效地控制货币总数,采用新的、创新的财政手段;简化关于贸易和生产的规章制度,采取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重大举措,进行关于更好地使用公共行政服务和关于加强全国行政事务组织的研究,以及采取措施吸引外国投资和特别在区域和次区域一级扩大经济、社

会和环境关系与合作,这些只是在第一个计划下推行的一些政策。

根据在这些工作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和吸取的教训,在1995年3月21日,即伊朗年年初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

伊朗近几年来取得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显示了我国公共行政在发展方面的努力和力量,这方面的例子包括:

第一,1979年革命之前只占国家外贸5%的非石油出口商品1995年达到50亿美元,占我国外贸30%。第二,转向出口从罐头食品到石油化学产品的具有更高价值的加工货物和商品。第三,贸易收支顺差1995年达到50亿美元。第四,预算赤字从1988年至1989年的50.1%下降到1992年至1993年的1.8%,并将在1996年至1997年时期成为零,与此同时,在过去几年中,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平均大约为7%。

第五,发展预算在总预算中的份额从1988年至1989年的19.4%增加到38%,预计将于1996年至1997年期间达到48%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这一步骤在伊朗经济的整个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第六,基础设施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给成千上万的城市、城镇和村庄,包括我国偏僻地区提供了饮用水、公路、学校、电话服务、医务所和其他基本的服务。到1995年至1999年第二个发展计划时期结束时,将向98.9%的城市居民提供用管道输送的洁净的水。

第七,在能源部门,除了应用经济工具外,执行了重大项目,以便扩大在我国蕴藏量丰富的天然气的使用,并提供含较低污染物资的能源以满足城市和农村的需求,从而保护环境。预计到第二个发展计划时期结束时,全国人民将可得到这种服务。还在为和平目的利用热能与核能方面进行了投资,以鼓励进一步利用干净和可再生能源。

第八,正在继续努力在医药和医疗设备生产方面实现自足。第九,不久以前伊朗还依赖工业化国家解决甚至最简单的技术问题,今天,诸如建造水坝、发电厂、炼油厂、石油化学产品综合企业和地铁之类的巨大项目由伊

朗人自行设计和实施。例如,在今后几天,马什哈德-萨拉克斯铁路重大项目将把东亚及中亚各共和国同南方的波斯湾和西方的欧洲的主要港口连接起来。这一项目完全由伊朗人铺设而成。

第十,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发展能力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伊朗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加入了执行国外项目的技术援助方案。第十一,粮食生产从1979年不到要求的50%增长到1995年的86%。这一增长是在人口大约增长一倍的同一时期取得的。

第十二,继续采取紧迫措施消除贫困,尤其通过一系列灵活的政策、国家资源管理、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和创造就业机会。第十三,保险业增长了62%。第十四,人口增长率从3.6%下降到1.7%。第十五,全体人民的识字率从1979年的47.5%增加到1994年的82.6%。在同一时期,1977年只有35.5%的妇女识字,1994年达到78.1%,农村地区的识字率从30.5%猛增到75.1%。

最后,我要强调,坚持伊斯兰教价值观念大大促进了完成在实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规定的指标和设想的目标方面的公共行政任务。我们的经验和成功再次表明,国营部门如果适应它所服务的社会的信念和背景并以此作为动力,它就可以如何地有效和高效率。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哈萨克斯坦代表发言。

阿雷斯坦别科娃女士(哈萨克斯坦)(以俄语发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认识到紧迫需要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以为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并需要加强《丹吉尔宣言》、大会第49/136号决议以及其他联合国文件所反映出的国际社会在这方面采取的步骤。

哈萨克斯坦代表团感谢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关于公共行政和发展的报告(A/50/847),以及他极为发人深省的介绍性发言,它为讨论规定了十分积极的格调。

我还要提到公共行政和财政专家小组报告的有益性和及时性,它包含极为全面的分析材料和引人注意的建议。

哈萨克斯坦欢迎联合国努力加强在公共行政和发展领域中采取的措施的透明度,并支持联合国在提供信息和服务方面发挥协调作用的设想,发挥这种作用基于收集和传播这种信息,并考虑到本组织在公共行政和发展领域中积累的经验。我们还充分同意这种观点:即改进行政体制、提供咨询服务、培训人员和其他活动,需要联合国和捐助国的优先注意。

国际社会在加强各国政府和国家机构在确保各国稳定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方面所面临的目标和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我国加强公共行政和财政潜力的需求之中。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出现,一直逐步掌握改变其经济关系的困难和矛盾的道路。我们一直进行正在展开的经济开放活动,彻底铲除了早期的中央计划体制,并正在建立一个确保货物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市场基础设施。改革的进程正在国家所有制方面展开,使私营企业有更大的余地。

对于各国政府及人民来说,第一个五年生活是积极学习和参与世界事务的时间。对我国来说,这段时间是在确立国家地位、缔结经济纽带、创立文明社会的各种体制以及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

在秘书长的报告以及在摩洛哥代表团提交的决议草案中,公共行政的体制包含更广泛的方面,包括选举、司法和法律改革以及加强文明社会。在这方面,应当强调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新宪法庄严载入了基于三个权力之间十分明确区分的公共行政的法律基础,这三个机构为立法、行政和司法。执行共和国宪法中这些规定的一个例子,就是选举出一个两院立法机关、颁布司法和法律改革以及发展和加强社会的民主基础。

根据最近通过的把改革延续到1996-1998年期间的国家行动纲领,以及加强已在我国实现的宏观经济稳定的最重要任务,我们计划推行结构—体制改革,加强国家对自由企业的支持,加强国家权力体制、法制和法律秩序、以及货币和财经纪律。我们高度重视改善国家经济管理机制和使管理分权化及执行改革,扩大和加强地方行政权力机构的职能。

鉴于我们正进入改革的新阶段——即实现立宪改革，政府正在改善行政体制，并使其信息服务达到新的水平。这需把经济管理和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移到区域一级，并重组公务员制度。

共和国政府现在已开始推行一项政策，它在执行改革过程中有效地结合行政集权制和分权化，并逐步把目前大量的职能和权力从政府、各部和国家机关移交给区域一级，同时通过适当的权利移交而正在加强责任的分散。

政府的区域政策旨在为在各区域和整个国家有效利用区域经济增长因素、加强共和国的统一和独立、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改善环境状况而创造条件。

我国在公共行政领域中正推行的改革，是对正向公务员提出的根本属于新型的要求的反应。这首先涉及提高政府雇员的专业能力，并使他们能够掌握最进步的管理方法。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通过了1996年关于共和国公务员制度的法律。

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耶夫在给秘书长的关于世界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成果的信件中指出：

“哥本哈根高级会议的成果，为我国今后几年及以后的社会政策奠定了基础”。

哈萨克斯坦政府尤其优先注意为人口提供社会保护的制度的效力，给予更集中的关注并明确阐明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职责和财政责任。共和国正执行一项由世界银行批准的社会保护项目，它旨在使向人口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合理化。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正探讨与联合国和公共行政领域中其他国际组织之间进行合作的各种方法和手段。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各国之间正通过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制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和会议而广泛交流有关目前一些行政问题的经验和信息，包括调整国家体制以适应民主改革的要求、推动经济改革、培训人员等等。

这种有益合作的一个例子就是于1995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举办了一次有关投资和走向市场经济的条件的国际

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联合国发展支助和管理事务部同哈萨克斯坦政府合作举办。

该研讨会使在执行投资政策方面具有不同经验的各国代表聚会一堂。与会者都认为，所进行的非常详尽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人们得以了解各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情况下解决投资问题的办法。

哈萨克斯坦将继续扩大同联合国的合作，并欢迎联合国为改善公共行政系统和加强过渡经济国家的人力资源潜力所作的各项努力。

本次续会提出的各项建议和作出的决定无疑将给协调各项努力和集中国际社会的知识提供新的动力，以便改善公共行政体制，为可持续发展和改善各国人民的福利创造条件。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打算继续在实现我们共同目标方面同联合国会员国进行建设性合作。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保加利亚部长会议改革司司长奥格尼扬·帕诺夫先生发言。

帕诺夫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为全面讨论公共行政问题举行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续会。我们对秘书长提出关于公共行政与发展的报告(A/50/847)表示赞赏。我们注意到公共行政与财政专家小组的报告(A/50/525)，并认为这份报告很有意义。

在听取前几位发言者的发言之后，可以万无一失地说，许多国家，特别是所有过渡中国家都在进行行政改革。对后者来说，这种改革已证明不仅是公务员制度现代趋势的前奏，而且还是任何面临挑战的新兴民主社会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至关重要进程。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有一个新型、专业化、面向公民并忠于政府的国家行政体制。在这方面，可以阐明若干先决条件。我们认为，行政体制特别应该及时回应社会和公民的需要，规定社会目标和管理市场经济的规则，鼓励个人主动性和促进私营部门，并实现成本效益和效率。

保加利亚政府最近已正式申请成为欧洲联盟的正式成员。我们已经开始为加入进行复杂对话，这必将给我国行政体制提出更高标准。为此目的，欧洲一体化政府委员会已于1996年3月通过一项题为“新型行政体制”的行政改革战略。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正如我国行政改革蓝图所强调的那样，我们认为，改变我国行政体制将需要时间和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和保加利亚公民的需要。在这方面，提出了以下我们希望在不久将来实现的优先目标：第一，在工作业绩基础上评估国家行政职能、体制和规模；第二，下放权力和提高地方行政作用，同时进行切合目前情况的培训；第三，利用信息技术评估业绩和指导工作；第四，为提供高质量服务和提高专业技能而采纳新的鼓励办法。

我国代表团愿表明，我国愿同其他国家分享行政改革领域的经验。我们相信，大会就公共行政与发展问题召开这一联合国主动行动已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并将证明相当有益。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阐明对本次续会后续行动的立场。

第一，我们也认为，在国际一级，联合国系统处理公共行政与发展问题的主要责任应该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来承担。

第二，应充分完善联合国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各项活动，同时顾及第十二次专家会议所确定的优先领域。在这方面，已积极参与其中许多领域工作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应发挥主要作用。

第三，应设想也给欧洲经济委员会规定公共行政领域的具体任务。

第四，应促进多边合作方案和双边合作方案之间具有更大的互补性。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约旦公共行政与发展部长卡迈勒·纳赛尔先生阁下发言。

纳赛尔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今天谨代表我国约旦在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关于公共行政与发展问题的续会上阐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公共行政为有效促进各领域的发展需要应发挥的作用。

我要借此机会向所有参加本次会议筹备工作的人表示衷心感谢和赞赏，本次会议的目标是找出最有利的方法，从而采取实质性步骤，提高各国公共机构的能力，并使联合国更有能力激发各国公共部门的能力，以便为各领域的发展建立坚实基础。

约旦的公共行政包括各部、各公共公司和部门，它们同私营部门并同各阿拉伯和外国机构、组织和国家充分合作，监督和参加无论政治、社会、文化还是经济层面的各种发展活动。

几十年来，约旦幸运地一直有其公共行政首脑的杰出领导，他充满了洞察秋毫的远见和创造性能力，能够展望未来并确定奠定实际发展框架所需的各种步骤，这种领导也能够在目前阶段使建设和平工作得到最后落实，希望我们区域将成为一个能够容易吸引投资和投资者的和平地区，以加快发展步伐。

约旦基于充分遵守《宪章》和联合国各项决议的对外和对内政策都是非常扎实和稳定的。因此，我们很荣幸地代表约旦支持联合国在发展领域中的各项建议。我们也珍视在这一领域中同其他国家的代表交换意见和交流经验，并且我们谨向专家小组表示支持，该小组能够适当地制订了总的框架，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吸引了联合国对和平时期开始的约旦项目的支持。

在研究了公共行政和财政专家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的报告(A/50/525)并对其各项建议进行审议之后，约旦政府谨表示完全支持报告的结论和建议，希望简单地阐述它在公共行政和发展方面的优先项目。

在政府研究和制订政策的能力、改革行政制度、改革文职机构和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开发人力资源和进行培训等方面，约旦首相批准了一项适用于各级公务员的综合行政发展计划。公共行政研究所目前正在执行该计划。

公民第一的概念被认为是头等重要的,因此通过简化程序和下放权力就能够以迅速、简单和可行的方式完成同公民的交易。

约旦政府也正在研究文职机构条例,以确保征聘工作中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公平。

另外,约旦已经为公共行政通过了一个全国信息项目,谋求为发展领域中的信息交流创造一个有用的网络。

已经对一些公共机构进行改革,使其能够集中精力进行规划、控制和后续职能,而不是直接干预生产和执行活动。

约旦政府制定的这项行政计划的目标是宏大的,需要得到联合国,特别是大会的各种支持。约旦的民主与和平的存在突出了这项计划的重要性。在使计划所载的概念具体化的过程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约旦政府的政治意愿。

在环境保护领域中,约旦制定了一项全国信息战略,建立了一个保护环境的新的公共公司。现在需要的是对这项战略的支持、对这一公司采取的步骤表示赞同、以及协助设计和执行有关约旦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项目。

在社会发展领域中,我国的重点是家庭和儿童问题、消除贫困、同失业作斗争、家庭生育项目、特别教育、残疾人就业和发展地方社区中心。

我们请联合国支持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即把社会援助网络、社会保护、国家人口战略——约旦首相办公室最近通过了该战略——以及社会发展战略的各组成部分统一起来。我们也请它进行编写有关儿童法律的后续工作,帮助提高社会领域中公共行政的水平,以便确保向应当获得人道服务的人们平等地提供服务。

至于公共和私营部门相互关系的结构,约旦的公共政策强调私营经济部门需要进行革新,鼓励公共机构实现私有化,并且为吸引投资奠定适当的基础。已经为促进投资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公司,我们希望它将得到支持。

在金融和财政管理领域中,政府集中精力加强公务员继续执行1996-1998年经济复苏和纠正方案的管理和技术能力,以便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我们请联合国提供约旦减少其债务负担所需的支持,使它能够保持财务稳定并限制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基础结构方案领域中,约旦的优先重点是确保在继续展开发展进程时对进行维修,特别是技术性维修的重要性的认识。它也强调对基础设施的基本要素进行投资的重要性,例如水、电资源、电信服务、全国公路网、气象学、在王国各地建立铁路、以及扩建阿克巴港口。

在发展项目领域中,我们请联合国协助约旦建立一个具有跨学科能力的高度称职的专家小组,负责对公共政策进行精确的分析,以确保发展预算不会承受政治项目的负担。该小组也将负责就通过贷款、赠款和援助金资助的项目进行谈判,以保障有关这些项目的协定不会相互冲突。

约旦建议并支持把专家小组变为类似于统计委员会和人口委员会这样的联合国机构的想法。约旦建议把这一新机构的名称定为“公共行政和发展委员会”,并且它将作为在公共行政和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唯一机制。也可指望它作为一个技术委员会和联合国同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以确保进行最好的合作并对联合国通过的所有公共行政项目进行后续工作。

约旦支持为提供发展资金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想法,并进一步支持为确保这样一次会议的成功提供各种机制的设想。发展中国家尤其会从这样一次会议中获得极大益处,这样的会议应当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举行,资金由联合国提供。如果能够确保会议的资金来源,约旦准备担任这样一次会议的东道国。

约旦政府正在制订一项同腐败和起反作用的官僚机构作斗争的国家战略。这项战略的基础是提高公众认识、修改过时的条例、以及引进新的和公正的条例框架,以确保防止各种形式的腐败。这项主要以文职机构道德标准为基础的拟议中的战略将把重点放在行政培训与文化之上,并强调有效控制管理职能。

我谨再次祝愿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续会圆满成功,并希望它将以各种必要的方法和各种可能的方法支持发展的各个领域。

为了简短起见,我在发言中概述有关约旦需要得到支持的发展项目的工作文件,该文件将分发给各位代表。其中也包括了一份行政发展计划的翻译稿,该计划概述了各种形式的行政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典代表发言。

奥斯瓦尔德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瑞典完全赞同意大利早先代表欧洲联盟表达的意见。多年来,瑞典一直重视公共行政、民主化和善政以促进社会发展的问題。我想到的最近一个例子当然就是去年10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公共行政和社会发展会议和讲习班,作为这次续会前筹备工作的一部分。瑞典政府主办了这次会议,而且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报告已经在这次会议上作为大会正式文件分发。

瑞典正在审查其外交和发展合作政策,使它成为一项全面的瑞典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目标有三:和平、民主和发展。

这些目标显然相互关联。在世界大多数地区,今天存在的威胁不是外国军队,而是贫困、环境退化以及因苦难和耻辱而产生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安全已经不再主要是一个军事问題。实现永久和可持续的和平需要建立信任、正义和机会平等。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民主的文化具有防止和解决冲突的更大潜力。必须鼓励各国内继续实现民主化,作为一个民主的国际社会的基础。

瑞典有幸作为最近设立的支持世界各地民主化进程的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的东道国。14个国家和若干国际机构已经携手辅助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为长期加强民主而努力。我认为,摆在关于公共行政与发展问题的续会面前的许多问題都同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的重点——如地方民主——直接相关。

在过去几年中,若干次全球性联合国会议已反映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主要挑战。去年春天在哥本哈根的社会问题首脑会议上,各国同意,

“民主和透明与负责的治理与行政……是实现社会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础”。(A/CONF.166/9,附件一,第4段)

与会各国政府承诺通过权力分散,对公共机构的公开管理和加强文明社会和地方社区发展其自身组织、资源和活动的能力和机会的办法,来加强人民参与制订和执行社会及经济政策和方案的能力和手段。

不用说,后续执行这些不同的承诺与目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要在社会各级有专业的公共管理。

这一点也要说是令人伤心的。经过十年简单地宣传市场有多大的能力,现在是重新回顾公共责任的中心和关键作用的时候了。这就是社会市场经济和无管理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别。

然而,在实现善政和有效公共管理方面,我们怎样才能促进建立或改善,或者同时建立和改善我们各自社会的能力?

必须有良好的政策,然而,如果没有贯彻落实和推行政治改革的能力,公民可能对政治进程失去信心。一个文明社会和民主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适当和合法的公共机构的发展。

这些包括如一个可行的议会、有效的地方政府、一个强有力的财政部、有效的税收和关税机构、一个组织良好的中央银行、一个可靠的统计部门、一个选择和训练公务员的制度等等。

然而,问題还在于,如何才能设计一套结构,使它不仅是国家、区域或社区的工具,同时也是促进民主与透明度的指导精神。

在促进尊重民主和法治时,公共行政体系服务的地方社区、非政府组织、少数人团体、工会和人民必须积极参加。

大会本届会议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机会,以便就一个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课题交换意见。专门召开某些大会会议讨论各种重要课题的设想,对我们有吸引力。在今后处理各种全球性问题时,这种工作方式也许可以更加经常地使用。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尼泊尔代表发言。

沙赫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续会提供的机会,以审查公共行政和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

九十年代带来了多种挑战和机会,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所有国家,不论是大国或小国,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被迫重新思考公共行政与发展的问题。我们的组织本身现在也在进行改革,其目标一句话,就是少花钱多办事—加强责任心、提高透明度、效率和代表性,同时又希望不要遗忘了《宪章》的基本原则和它对人类的承诺。

我国代表团承认每个国家的公共行政和发展制度具有其独特性的现实。作为一个对基本人权有坚定承诺的推行民主的国家,我国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在现在形成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承认一套普遍适用的公共行政原则的存在和它在发展中的作用。提高生产力、责任心、透明度和反应能力必须是任何公共行政制度的特点。

在突出说明善政的普遍特性时,我没有什么必要强调公共行政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在实现从中央计划和实施到权力下放,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营企业到私有化的顺利过渡方面,公共行政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尽管私营部门作为促进迅速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工具有着越来越大的有效作用,尽管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在加快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方面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但仍是政府在发展基础设施、对付社会经济差距、确定发展的优先领域和行使一些基本职能方面发挥中心作用。这些职能包括维持和平与秩序、捍卫民主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保护环境等。即使就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有效运作而言,必须靠公共行政来创造必要的条件。

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在他的开幕词中指出,民主化是促进改善公共行政的最重要因素,这句话给我国代表团留下深刻印象。我们认为,民主化和善政是同义词。没有参与式的决策,根本不可能有效力、反应灵敏、透明度和负责的公共行政。民主是给公务员提供共同一致的动力,促使他们在为发展提供物质和服务方面发挥最大效率和效能的唯一治理制度。只有民主制度把人民放在所有发展努力的中心位置。在每个民主社会中,公共行政应该有使公民了解正在计划的任何重要措施的基本义务,以便他们能够参与参与式决策。在这方面,我要补充指出,尼泊尔《宪法》保障所有公民享有寻求并获得有关对公众很重要的任何问题的情况的合理基本权利,除非具体的法律另有规定。

摩洛哥部长介绍的载于文件A/50/L.69中的决议草案将使大会建议,设立一个适当机制,以确保联合国在公共行政领域的方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和布雷顿森林机构之间的活动得到最大程度的协调。它还建议把公共行政和财政问题专家小组定为联合国公共行政和发展问题委员会。按照决议草案的规定,大会将认识到需要进一步确定联合国作为公共行政和发展领域的全球典范中心的作用,优化这一作用使其在处理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新出现的公共管理问题时更加有针对性。大会还将认识到各会员国需要加强有效开展公共行政的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并建立善政的条件,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可在这方面发挥日益有意义的作用。

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宣布支持这项决议草案。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希腊雅典大学公共行政教授安东尼·马克里迪教授发言。

马克里迪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希腊代表团要与欧洲联盟的伙伴和其他会员国一道热烈祝贺秘书长提交的报告,祝贺摩洛哥政府提出这项倡议。

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公共行政及其在发展和现代化方面的作用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公共行政和财政问题专家小组的报告是一份有价值的文件，它是就与行政现代化和改革有关的问题进行全球思考和审议的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标志。

这次续会是非常及时的。它是在公共行政在过去10至15年里可悲地遭到忽略的背景下举行的。政府和行政曾经被认为是现代化和改革的火车头和不可缺少的机制，然而，在这个时期它们却遭到贬低和批评，被说成是规模过大、耗费巨资、没有效率和效力，而且官僚色彩浓厚，总之，政府和行政被认为是进行现代化和改革的障碍，而不是工具。

因此，世界各国开始实行改革措施，以限制公共服务的浪费，减少开支，提高行政工作的质量。

改革精神有助于使人们再次重视费用意识、效率、效力和精简灵活的管理结构和程序。它还导致出现了一种按照公共管理正统做法的规则和原则运作的面向市场、对公民要求反应灵敏的公务部门新模式，它声称与以往陈旧过时的官僚机构有实质性的区别。

然而，如果让此类由管理部门发起的行政改革走得过远，带着狭隘的短期目标教条地进行这种改革，那么它可能会引起不稳定、破坏政府的关键能力，这一能力就是处理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为未来规划，以及保持对各个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文明共处来说极其重要的和平的社会交往条件。

事实上，当今世界充满了能说明问题的成功例子和失败教训，有着各种善意和恶意的、得到适当指导和执行不当的国家政府机构和行政机关改革和改组的计划与策略。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许多资料和经验中得出结论。

的确，探讨从世界范围的这一经验中所得出的必要教训的最好时机或地点莫过于大会这次续会。

按照重要历史学家的说法，二十世纪已经结束，因为它的基本特征已经最后定型。我们现在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一个新千年和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迅速转变

和变革的时代，它在全球规模和范围上受到技术的推动。毫不奇怪，这一变革的时代带来了新的挑战、风险和机会，它们影响到全人类。

世界环境的状况、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口大批迁离家园和随之而来的人权问题只是其中的明显例子。

我们是否令人满意地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采纳和应用的解决方法。这反过来取决于会员国行政机构的管理和决策能力。

这把沉重的负担压在各国政府和它们所采取的改革计划和策略上。在本周内，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些计划和策略，并概观共同的问题和用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各种策略。毫无疑问，这一信息是全世界改革者和现代化者手中的最宝贵的财富。

在这一方面，联合国在提供交流改革的数据、经验、意见和模式的常设信息中心和焦点方面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交流经验，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其性质和影响方面是全球性的。

用专家小组报告的话来说，加强联合国作为

“一个全球交换资料保存中心和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行政与发展研究交换中心”(A/50/525, 第159段)

的作用也许需要再次研究联合国的体制结构。

尤其看上去适当的是，第一，公共行政改革和发展问题应作为一个经常项目列入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议程，并每隔两年定期审查和审议。应当指出，秘书长在其报告中也承认这一点。

第二，应设立一个临时和后续机制，例如公共行政和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与协商小组密切合作，每年开会并为大会届会打好基础。此外，该委员会可逐渐演变成一个关于公共行政和发展的国际监察委员会，并证明有助于起草公务员的国际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这一准则可随后提交大会讨论并提交各会员国批准和应用。

第三,区域和次区域倡议应受到欢迎,目的是创造定期的机会以交流经验,并就与行政现代化和发展有关的特别问题和关切交换意见和资料。

这种在公共行政和改革中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这种合作不仅在加强投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在改善和平共处和相互谅解的条件方面发挥作用。

有人说,历史教我们的唯一东西是,它永远不教我们任何东西。然而,从更加乐观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应该错过这一历史机会在公共行政和发展领域取得一些进展并赢得一个国际合作的新时代。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1976年10月18日第31/3号决议,我请英联邦秘书处管理和培训服务司司长莫汉·考尔先生发言。

考尔先生(英联邦秘书处)(以英语发言):我带来了英联邦秘书长埃梅卡·安姚库酋长阁下的问候,并代表他感谢你,代理主席先生给英联邦这个机会参加大会关于公共行政和发展的第五十届会议续会。

英联邦秘书处有幸参加了筹备本届会议的各种活动。秘书处参加了公共行政和财政专家小组,并且还同联合国协作在非洲和亚洲举行区域会议。

1991年《哈拉雷英联邦宣言》确定公正和诚实的施政是英联邦价值观念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英联邦协助各会员国促进善政和负责的行政自那时以来一直作为优先方案领域之一列入秘书处的工作计划中,因为我们认识到,有效的公务员制度是公正和诚实的施政基础的必要部分。

所有英联邦国家在公务员制度的体制、制度、传统和价值观念方面存在的许多共同特点大大促进了英联邦在公共行政方面的合作。这导致在整个英联邦公务员和政治领袖之间相当多地分担问题和分享成就。这种合作的结果之一是秘书处关于制定英联邦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中良好做法的模式的工作。

许多英联邦国家采取了类似的改革战略,例如强调重新确定决策和行政之间的关系,更大的责任制、任务的定

义;工作表现衡量标准和控制资源的权力下放;需要与私营部门更密切地合作;接受持续的组织改革;以及服务质量概念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加强在这一方面的英联邦合作和援助,英联邦各国政府首脑在1996年11月在奥克兰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题为“走向新公共行政”的英联邦秘书长关于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倡议。这项倡议旨在提供一项加强的、综合的援助成员国家的方案,其中包括建议、培训和政策分析,并着重于制定总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战略,执行改革方案的具体组成部分,以及发展国家能力以支持改革。

这项倡议的执行将在同联合国以及双边和其他机构的密切合作下进行,包括三个泛英联邦非政府组织:英联邦公共行政和管理协会,该协会是国营和私营部门高级决策者网络;英联邦地方政府论坛,一个在地方一级支持善政的组织;以及英联邦信息技术促进发展网络,一个促进在政府中使用信息技术和全球网络的机构和专业人员网络。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感谢你、代理主席先生给我们这个机会向大会介绍我们的经验并重申我们愿意和渴望继续在公共行政和发展这一重要领域中同联合国合作。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1950年11月1日第477(V)号决议,我现在请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行政发展组织总干事艾哈迈德·萨卡尔·阿苏尔先生发言。

阿苏尔先生(阿拉伯国家联盟)(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有这个向大会发言。我还要赞扬摩洛哥王国政府提出的倡议和大会对1994年《丹吉尔宣言》提出的召开第五十届会议续会召开讨论公共行政和发展主题的要求作出的积极反应。在过去五十年中积累的世界经验证明,行政是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有幸代表的阿拉伯行政发展组织,于1996年11月举行了其部长级大会,以准备参加大会的本次续会并讨论公共行政和财政专家小组草拟的文件。各位部长们决定本组织应准备一份文件以表达阿拉伯国家对这次续会的主题的共同看法。

在这一背景下,我要强调这份以文号A/50/918分发的文件中所提出的一些突出要点,并总结一下阿拉伯国家对加强公共行政能力以支持发展的需求和优先任务。

联合国应给予更多注意和支持的阿拉伯区域的优先任务和需求,可以总结如下。第一,需要提高发展政策的制定和管理方面的体制能力。辅助内阁的各办公厅以及负责经济、公共财政的部长、各位省长办公室以及私营部门机构最需要这一点,这将包括建立决策支助中心以及加强已存在的中心,并加强负责执行发展政策和计划的机构,以及那些代表私营部门和文明社会的社团。这将促进它们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进程,并加强其监督这些发展计划并采取后续行动的能力。

第二,需要帮助各国政府发展公共机构的结构、职能和工作程序并使之合理化。还需要帮助改进工作标准并加强责任制,并强调公务员制度的质量和效力以及现有资源的成果和有效利用。

必须加强地方政府机构的能力,因为它们十分密切地了解公民的需求,因而能够同他们有效地互动。

第四,同样需要加强司法制度在人力资源、设备和信息设施方面的能力。解决争端的有效进程改善了私营部门的投资环境和执行情况。

第五,需要建立和发展行政发展机构的能力并调整其作用,以便能够在各级政府提供需要的支持,并能够在公共机构中建立和有效执行运作管理制度。

第六,需要特别优先考虑重建该区域一些遭受冲突和武装斗争的国家——特别是索马里、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政府能力,使它们能够在和平与稳定的时代掌握发展计划。

我高兴地指出,所有这些需求都在向大会提交的阿拉伯行政发展组织文件中详细介绍的10个不同项目中得到解决。它们将指导阿拉伯各国政府、各机构、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在满足其优先需求方面的努力。

阿拉伯行政发展组织赞扬并支持专家小组的建议、联合国公共行政方案的努力以及秘书长向大会提交的报告。阿拉伯行政发展组织尤其支持专家小组在1996年4月

11日和12日在本大厅中举行的会议上提出的建议,以及摩洛哥王国政府提交决议草案的行动,该草案是由摩洛哥首相马苏德·曼苏里先生阁下在大会本次续会第一次会议上介绍的。

本组织谨提交另外一些建议供大会审议。简言之,首先需要加强联合国负责发展与行政改革的机构的作用,我们尤其强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公共行政方案的作用,因为它们能够为体制发展计划提供有效支持并持续调整其计划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第二,联合国这些在发展与行政改革领域中工作的机构,必须同更熟悉该区域各国需求、优先任务和情况的区域机构进行更有效的互动。它们能够找出各自区域的问题并确定最更适当的做法,它们还有能够建立地方能力的当地专家的络网。有了适当的支持,同这种机构之间的互动,能够建立区域能力,从长远来看,将减少对国际机构的依赖。

第三,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和双边机构同样需要同其在受援国的对等机构建立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将促进经验的交流和责任的分担。确实需要在捐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以加强地方和国家的能力,继续自身发展,借鉴经验和持续评估,以及衡量在指定的机构工作中取得的改进。

还需要有效协调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经济改革和行政发展的国际和双边机构提出的计划,以使它们在同受援国交往和交流专门知识时实现更好的协调。

最后,我谨提议,为了实现本次续会的目标,应成立一个常设论坛,以确定和推广最好的行政方法和经验,并促进各国之间的经验交流。这样的论坛应收集、监测和分析各国提出的倡议或实行的计划,以执行大会将通过的各项决议。其结果应载于例如可每两年发布一次的关于在全球支持发展方面行政改革实际执行情况的报告之中。

下午12时50分散会。